

# 潜在价值的《夜》:妇女命运的悲剧性\*

——丁玲短篇小说《夜》的再解读

袁洪权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短篇小说《夜》在丁玲的文学研究中被忽视或被误解,这对研究真实的丁玲是有误区的。论文立足于《夜》,试图通过小说主人公何华明与三个女性关系的解读,揭示文本的潜在价值,即丁玲对女性命运的一贯关注。

**【关键词】**《夜》;潜在价值;妇女命运;悲剧性;革命政权

**【中图分类号】**I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4-0016-04

1941年6月10~11日,丁玲以晓菡的笔名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夜》。这个小说文本在丁玲研究中很少被重视,这种忽视导致延安时期丁玲思想被无意遮盖。即使对这个小说文本注意,但对它的阐释又存在严重误解,如有研究者认为,“丁玲通过对何华明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生动而又充分地展现了一个不脱产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意识世界’:‘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只能‘切切实实地从变换旧的中国生长着’。”<sup>[1](P206)</sup>连冯雪峰1947年为《丁玲文集》写后记时也持这样的观点:“《夜》,我觉得是最成功的一篇,把在过渡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完满地表现出来了。体贴而透视,深细而简洁,朴素而优美。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sup>[2]</sup>显然,在研究者和阐释者看来,丁玲对主人公何华明持赞赏的态度。但立足于文本,我们发现这样的评论并不符合丁玲的本意。其实在作品出来之后,现代作家骆宾基就谈到他的阅读体验:“作者望着何华明的背负着中国旧时代的赐物走向新时代——正象背负着过时的棉衣在春日的旅途上的旅人——还潜伏着对于中国农村的往日妇女的叹息,也正象对于那旅人所负的过时的沉重棉衣的叹息。”<sup>[3]</sup>文本的真正价值其实就在于丁玲对妇女命运的关注,而骆宾基正读出文本的潜在价值:丁玲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如果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关注的主要是从敌占区回来的妇女的命运悲剧的话,我觉得《夜》正好表现的是处于革命边区——政权下妇女命运的悲剧性。从敌占区回来的贞贞受到的是来自传统的贞洁观念的歧视和革命阵营要求革命者的纯化,身在革命政权之中的何华明的妻子、青年妇女清子和青联主任的妻子

侯桂英仍然面临妇女的悲剧性命运,她们无法抗拒来自革命阵营内部对妇女的歧视。

小说的主人公何华明被置于人物关系的中心,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他与三个女性之间的关系上。三个女性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女性性格,而何华明对这三个女性的行为、话语的处理方式,是文本的主体情节。正是在这样的行为、话语处理方式上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从三个侧面表现出妇女的被言说的命运。而这种被言说,恰如日本文学研究家高阜穰在《关于丁玲的〈夜〉》一文中说的那样:“以排除女性应有的价值而获得其地位的排除性欲的文化,只要回复被排除的价值,那么,性爱的主题正是与革命相重合。”<sup>[4](P383)</sup>在革命的一致性追求上,何华明表现出的行为和话语方式正是革命对女性的一种需要或否定。这就使妇女命运的悲剧性成为不可避免。下面我主要从何华明与清子、何华明与侯桂英、何华明与何华明的妻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解读。

## 一 清子:漂亮但有着肮脏的灵魂

清子是小说里面第一个登场的女性,当然也是小说里三个女性中最有魅力的一个,因为清子最年轻。为了能够说明问题,我们还是把目光聚集在丁玲对清子的肖像描写上。在小说中的清子是这样被传达出来的:

羊群已经赶进了院子,赵家的大姑娘还坐在她自己的窑门前纳鞋帮,不时扭转着她的头,垂在两边肩上的银丝耳环,便很厉害的摇晃。……

站在大门口看对山盛开的桃花的又是那发育得很好的清子。长而黑的发辫上扎着粉红的绒绳。从黑坎肩的两边伸出条纹花布袖子的臂膀,高高的举着,撑在门柱上边,十六岁的姑娘,长得这样高大,什么不够法定的年龄,是应该嫁人了的啊!……

收稿日期:2009-08-20

\*基金项目:西昌学院人才引进课题“延安文艺运动下文学思想变迁考察”(YJSB0616)的阶段性成果;华东师范大学优博基金“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中国文学界微观考察”(课题编号:2009063)的前期成果。

作者简介:袁洪权(1978—),男,土家族,重庆石柱人,博士生,讲师,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学史学研究。

清子很漂亮,这对何华明无疑是一种诱惑,“一个奇异的感觉,来到他的心头,把他适才在会议上弄得很糊涂了的许多问题全赶走了”,与他的糟糠之妻相比,清子年轻而发育良好,人又长得高大。这正是何华明心目中期待的女性之一,他在精神和生理上需要这样的女性,而他的糟糠之妻却不能给他精神上一点安慰,她比何华明大12岁,感情上存在着代沟,生理和心理上的代沟也是无法避免的,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妻子再也没有生育能力,而清子却正是这样的年龄——可以生育。清子是解放区政权中生活的妇女,但她与解放区的其他妇女的生活却有着根本的不同:黄昏之前仍然在“纳鞋帮”,这是当时进取的解放区妇女不可能做的事情,因为她们有更重要的或重大的事情应该去做。而正是清子的“纳鞋帮”事件,使人感到“她纳鞋帮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在干活,倒不如说是在消磨时光”<sup>[9]</sup>,消磨时光这样一种异常的举动,当然很可能会遭到非议的。革命阵营中是不需要这样消磨时光的,因为在革命阵营的人看来,消磨时光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种表现,它可以上升到对人定罪。清子无忧无虑地消磨时光,在革命者何华明看来就是一种罪过:“这妇女就是落后,连一个多月的冬学都动员不去的,活该是地主的女儿,他妈的,他赵培基有钱,把女儿当宝贝养到这样大还不嫁人……”显然何华明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他对清子既满意(年轻,可以生育),但又对清子不满意(因为他是地主赵培基的女儿)。如果要找出何华明对清子的不满意,也许唯一的就清子是地主赵培基的女儿,这样一个阶级归属的差异,使何华明感到没有办法超越。何华明显然感到了失望,对自己,对清子都产生了失望,“他有意的摇了下头,让那留着的短发拂着他的耳壳,接着便把它抹到后脑去,象抹着一层看不见的烦人的思绪,于是他也眺望起四周来。天已经快黑了。”

清子16岁的年龄,的确是她人生历程的开始,她即将步入社会,开始自己的人生生活,因为小说里间接提到了一个16岁的年轻而漂亮的女子,她与年轻的代理乡长结了婚。与清子同龄的人可以获得幸福,但清子却在遥望,因为她是地主阶级出身。连指导员何华明这样的人对清子都有这样的看法,我们更可以想象其他人对清子的成见又有多么的深!所以,当小说文本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感到很震惊:“常常会被别人善意的拿来取笑。”依靠代理乡长的16岁的女人会被别人善意的取笑,那么对于像清子这样出身的女子,被别人恶意地取笑也许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清子命运的悲剧性看来是无

法避免的。从清子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出革命阵营中对阶级身份的看重。对于阶级身份的强调,使清子被看作是一个心灵上存在问题的人,用当时的话说,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的人,心灵是不干净的。既然她的灵魂上不干净,作为革命阵营中的指导员的何华明就不能对这样一个女子产生一种亲近感。如果那样做,只会导致政治原则的过错。而这种政治原则的过错,是一个革命者不应该犯的。何华明在亲近中却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对清子产生了这样反感的举动,正是这种一种潜在政治原则的压力。既然清子生活在这样的地方,那作为这样的命运不幸也就不可避免了:清子漂亮,但灵魂肮脏。灵魂的肮脏是不可能让人轻易接近的。

## 二 何华明对妻子该怎么处理

何华明面对的第二个女性就是自己的糟糠之妻。何华明的妻子在小说中一直没有出现真实的名字,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日本研究者推断“与唐代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中写名妓一样,始终不露姓名”,我觉得这还是没有说出真正的实质。而阅读小说文本的过程中,文本给我们有提示:政治术语“物质基础”的被运用。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作物质,那么显然地就被物化,也就是被异化,那她也必然地被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失去了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价值选择。既然人被当作了“物质基础”,那她的名字问题就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名字对她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她的归属问题只能属于“支配”她的人,她成为私有物的一种体现。也许这才是理解小说中为什么何华明的妻子没有名字的一个真实的原因。所以,面对何华明的妻子,我们只能问:这个人在小说中该受到何华明的怎么处置?与清子的漂亮形成鲜明的对比,何华明的妻子已经42岁了。年龄上与何华明相差12岁,更重要的是何华明正处于30岁的壮年时期,妻子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甚至在性生活上显然无法满足何华明的需要了,所以当何华明面对妻子的时候,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失望的精神状态。

作为糟糠之妻,何华明与妻子之间的感情现在相当淡薄。离家已经三四天的何华明,特地被区委委员准许“回家”,原因不是与妻子之间的团聚,而是他们家唯一的母牛要“生产”小牛了,可能在“今天晚上”。他对自己的妻子不喜欢,认为她只是一个“只能烧烧三顿饭,四十多岁了的女人”。何华明对妻子明显地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情绪,每次回家他实在难以面对她的“抱怨和唠叨”。所以这次“回家”,他不是直接回到家里,而是“急急的跑到了家,走向关牛



的地方”(即牛栏)。他实在无法忍受妻子的外貌——“开始露顶的前脑”、“怕人的苍白的手”(与清子相比,真是一个恶女的形象)。从小说的写作来看,与其说是妻子对何华明的抱怨,不如说是何华明对妻子的抱怨。妻子在何华明回来后赶紧整理床铺,这在妻子看来才是“家”的象征。然而在何华明眼里,等着他回到家里、给他温暖的家的妻子在何华明看来是“埋伏得有风暴”。做这样的女人的确很伤心,面对丈夫何华明的这一系列举动,妻子实在无法忍受,她哭起来了,“眼泪便在脸上开了许多条河流不断的流着”,并用咒骂的语言表达出对自己命运的痛苦:“你是应该死的了,你的命就是这样坏的呀!活该有这么一个老汉,吃不上穿不上是你的命嘛……”但面对妻子的怨言,何华明该说些什么呢?他什么都“不愿说”,心里只惦念着牛,在他看来,“这老怪物,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牛还会养仔,她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不会下蛋了的母鸡”。由于妻子的不能生育,何华明就把妻子看作是一个比牛都不如的“老怪物”。而如果妻子能够生育呢,妻子的命运会得到改变吗?何华明对孩子也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享“天伦之乐”,孩子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帮手”。已经40多岁了,妻子没有什么崇高的追求了,她希望的是“安逸的生活”,丈夫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她是不懂的,“更其令她伤心的,是她明白她老了,而他年轻,她不能满足他,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

面对妻子的抱怨,何华明表现出最大的矜持,但还是在头脑中闪现出一个念头——离婚:

“把几块地给了她,咱也不要人烧饭,做个光身汉,这窑,这锅灶,这碗碗盏盏全给她,我拿一副铺盖、三两件衣服,横竖没娃,她有土地、家具,她可以抚养个儿子,咱就……”仿佛感觉到一种独身的轻松,翻了一个身,……

离婚的念头让他心情释然,他觉得离婚可以减轻他的痛苦,潜在里想和一个与自己同龄的女子结婚,比如说清子,毕竟清子的年轻,有生育能力对他来说是一种强烈的诱惑。他甚至为了解脱这种情感痛苦,可以把有生育能力的母牛也给妻子。

何华明与妻子之间的冷漠关系,一方面是由于妻子没有生育能力导致的,但更主要的在于妻子的“落后”让他作为政治指导员的身份的不适应性,“自从他做了这乡的指导员以后,他们便更难以和好,象有着解不开的仇恨”,何华明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落后,拖尾巴”,这对象主要是针对妻子的,妻子在政治上显得不够积极。但是何华明作为政治指导员这一身份,使他对离婚还是产生了顾虑!这老

家伙终是不成的,好,就让她烧烧饭吧,闹离婚影响不好”。如果说没有造成何华明和他的妻子之间的离婚案的发生,这也是来源于政治的压力。何华明作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成员,他必须接受一些政治给予个人的规定,个人的行为绝对不能给政治体制造成不好的影响。但这本身无法改变何华明的妻子作为女性的悲剧命运。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还是面临更深层面的意识考验。

### 三 引诱者侯桂英:革命内部的性爱处置

性爱问题被移植到革命问题上后变成了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这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恋爱”小说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一旦对革命者的形象塑造成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它在无形中会造成一定的禁区。这就是第三个女性——侯桂英的出场。与前面对清子和何华明的妻子的外貌进行描写相比,侯桂英始终没有形象面貌,“作者没有描写她的外表,无疑是因为她的政治身份,政治不允许把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外表”<sup>[6](P265)</sup>,这可以看出丁玲对革命者形象的描写的无形压力。对主人公何华明来说,侯桂英对他的诱惑力比清子还更具有威胁性,对她的处置也比自己的妻子更为棘手,因为侯桂英的个人生活并不幸福,她的丈夫比她小5岁,“丈夫才十八岁,而二十三岁的她却总不喜欢,她曾提出过离婚”。与何华明的离婚念头相比,侯桂英显然显得更为激进,她至少有勇气向丈夫提出离婚这样的举动。从采用这样的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侯桂英对自己幸福生活有自己的真正理解:结婚是与自己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举动萧军在杂文《续论“终身大事”》是大力赞赏的:“听到了女人们正面的、本质的敢于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这才是真正的大大进步的时候”<sup>[7]</sup>,侯桂英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已经不止一次找何华明了,“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他们两人在牛栏相会。何华明起来喂牲口,侯桂英也起来喂牲口,对侯桂英这样一位女性来说,喂牲口只是一个借口,她的主要目的是想接近何华明——自己心爱的人,“想说几句话”。特别是侯桂英的微笑,这在主人公看来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潜在的最大威胁),他表面上表现出一种讨厌,一种愤恨,但内心里“有时就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因为这样的举动(指侯桂英的微笑)正击中了何华明的要害。他的妻子没有这样的微笑,他的妻子也没有搭讪。相反,与妻子相比的抱怨和唠叨相比,侯桂英体现出的是对男人的顺从,而更为潜在的压力是侯桂英23岁的年龄使何华明在身体上的确需要

像侯桂英这样的女性。如果说清子由于她的家庭出生使她与何华明之间形成无形的鸿沟,那么他与侯桂英之间就应该没有这样的鸿沟,他们之间的结合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何华明的顾虑更加严重。因为他面对侯桂英的时候,“他感到一个可怕的东西在自己的身上生长出来了,他几乎要去做一件吓人的事,他可以什么都不怕”,与此同时,在这越轨的动作即将发生的时候,何华明下意识里知道自己是一个政治指导员,这身份的认可使他退却:“不行的,侯桂英,你快要做议员了,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在意识的深层意义上,何华明显然是作了深刻而矛盾的思想斗争,而这样的斗争也是相当的残酷,他需要人的理智战胜生理上的自然需求。何华明战胜了自己的自然需求,但这给他的妻子的悲剧性命运就增加了更严重的悲剧色彩,他与妻子之间还必须保持那种乏味的婚姻生活,妻子只能烧烧饭,喂喂牲口,永远停留在那种庸俗的生活状态之中。

侯桂英与何华明是革命同志,由于他们处于同一的政治规范之中,使他们受着相同的政治规则的制约。越轨的举动在革命阵营内部是不被允许的,特别是在延安边区这样一个地方,妇女曾经占相当少的比例,妇女的幸福生活就更存在问题。对于何华明这样一个处于过渡时期的人物,丁玲并不是简单地刻画,呈现出单一性的形象举动描写,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人物的内心心理进行深入的挖掘,使人物呈现出复杂性,这也才是在社会上中

生活的一个真实的人。

## 小结

对小说《夜》的文本细读是一种痛苦的考验,文本让我们发现了丁玲写作此小说的真正意义:主要是想通过何华明这一主要人物在处理三种不同的女性上表现出的差异性,但这差异性主要是由于何华明在政治身份认同中造成了妇女命运的悲剧性的必然性,他的这种政治认同就是对革命政权的一种认识,革命本身必须保持洁身自好才能保证革命阵营的纯洁性。《夜》当然对何华明的刻画绝对不完全是对一个阶级主体的刻画,相反,“那些隐晦地存在的复杂心理却并没有消失,也不可能成功地统一到阶级主体身份之中”<sup>[8](P232)</sup>,从而展现了何华明的丰富内心——痛苦的心理历程。《夜》写于1942年《讲话》以前,它受到《讲话》的冲击是不可能的,这也印证了丁玲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表达的她坚持的个人主义写作,表现出她文学写作的一贯性: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与探讨。但这种关注与探讨同当时延安的主流文化之间还是存在差距的,这使丁玲与延安话语之间的冲突甚至尖锐化的矛盾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如果说研究者在对小说研究中对何华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表面层面上,而著名作家骆宾基的解读却是建立在深层的文本内涵上,他看到了丁玲写作的潜在意义:对中国妇女命运的一贯关注。当然,从这一关注中文本还给予我们一定的提示:延安边区人民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这已为日本研究者所指出)。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杨桂欣. 丁玲评传[M]. 重庆出版社, 2001.
- [2] 冯雪峰. 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J]. 中国作家, 1948, 2.
- [3] 骆宾基. 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J]. 抗战文艺, 1944, 5、6.
- [4] 小林二男. 丁玲在日本[A]. 丁玲研究在国外[C].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5][6] 沃尔夫根·顾彬. 丁玲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夜》[A]. 丁玲研究在国外[C].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7] 萧军. 续论“终身大事”[J]. 解放日报, 1942/5/11.
- [8] 贺桂梅. 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 Potential Value of *Darkness*: Tragic Fate of Women

YUAN Hong-quan

(1. Chinese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2.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615022)

**Abstract:** 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true Ding Ling when the short novel *Darkness* has been ignored or misunderstood in Ding Ling's literary studies. This passage bases on the novel *Darkness*, and reveals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he text by way of the relationship interpretation of He Hua-ming and three heroines, namely, Ding Ling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fate of women.

**Key words:** *Darkness*; Potential value; Fate of Women; Tragic

(责任编辑:张俊之)